

Unique Mother Tongue

唯一的母语

——杨炼：诗意的环球对话



SEU 2605434

2605434

唯一的母语

——杨炼：诗意的环球对话

Yang Lian
Unique Mother Tongue

●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K815.6
19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唯一的母语:诗意的环球对话 / 杨炼著. —上海: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2. 4

ISBN 978-7-5617-9368-8

I. ①唯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诗人—访问记—世界
IV. ①K81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36803 号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
企划人 倪为国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唯一的母语:诗意的环球对话

杨炼 著

责任编辑 倪为国

封面设计 吴正亚

责任制作 肖梅兰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电 话 021-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(兼传真)

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×1194 1/32

印 张 7

字 数 130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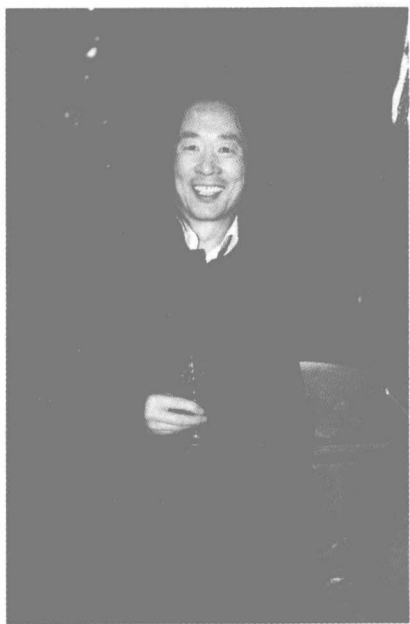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978-7-5617-9368-8/I·885

定 价 35.0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
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

杨炼在诺尼诺奖发奖仪式上

杨炼



1955年出生于瑞士，成长于北京。70年代后期开始写诗。1983年，以长诗《诺日朗》轰动大陆。其后，作品被介绍到海外，并受邀到欧洲各国朗诵。1987年，被中国读者推选为“十大诗人”之一，同年在北京与芒克、多多、唐晓渡等创立“幸存者”诗人俱乐部，并编辑首期《幸存者》杂志。1988年，应澳大利亚文学艺术委员会邀请，前往澳洲访问一年，其后，开始了他的世界漂流和写作生涯。目前为止，出版诗集十种、散文集二种、众多文章已被译成二十余种外文。他的作品被称为当代中国文学最有代表性的声音之一。

1999年，杨炼获得意大利FLAIANO国际诗歌奖；同年他的诗集《大海停止之处》，获英国诗歌书籍协会推荐英译诗集奖。先后担任德国“Lettre-Ulysess”世界报道文学艺术奖、德国威玛（WEIMAR）国际论文竞赛、“德国之声”国际广播文学竞赛等评委，以及斯洛文尼亚“Vilenica文学节水晶奖”评审团主席，“Free the Word国际笔会文学节”顾问等。近年来，他策划、主持了一系列中、外文之间的诗歌交流项目，如首届中英之间旨在深度交流的“黄山诗歌节”，中国、斯洛文尼亚诗歌之间的“方言写作”项目等，获得了国际诗歌界一致好评。杨炼于2008年在哥伦比亚举行的第74届国际笔会大会上以最高票当选为国际笔会理事，并于2011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77届国际笔会上再次当选。

目前，杨炼担任以伦敦为基地的私人国际文学艺术系列项目《唯一的母语》的艺术总监。专注于开创中文古典传统和当代写作间的创造性联系，强调对人生思考之“深”与创作形式之“新”间的必要性。他和英国诗人William N. Herbert作为共同主编，正编选一本全新的英译当代中文诗选，由英国著名出版社Bloodaxe Books出版（2012）。

杨炼自1997年起定居伦敦。

目 录

前言：

诗意思考的全球化

——或另一标题：寻找当代杰作 / 1

阿拉伯：

诗歌将拯救我们

——与阿多尼斯对谈 / 23

什么是诗歌精神？

——阿多尼斯中译诗选 / 35

再谈“主动的他者”

——与阿多尼斯笔谈 / 43

南非：

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

——与汴庭博对话 / 65

英国：

每个诗人都必须创造出自己的形式

——与英国诗人赫伯特、帕蒂和唐晓渡对话：

找到 21 世纪诗歌交流的语法 / 85

俄罗斯：

把蘑菇放进锅里

——与弗拉迪米尔·米库舍维奇对话 / 109

中欧/斯洛文尼亚：

本地中的国际：方言写作

——与阿莱士·施泰格尔对话 / 137

日本：

开掘每个人自己的智慧之井

——与高桥睦郎对话 / 165

香港：

冥思板块的移动

——与叶辉对话 / 189

诗意思考的全球化

——或另一标题：寻找当代杰作

一

什么是当代中文诗的杰作？如何找到它们？这个提问令人晕眩。仅就中文诗人而言，从数量上说，就听说今天中国有二百万写诗人口，二百万人，每天在“生产”多少作品？选择杰作，首先在数量上就是一个天文学。更困难的是质量，所谓杰作，该放进什么价值系统中去判断？最方便的捷径，当然还是藏在“中文”这个掩体后面，依托着三千年绵延不断的诗歌传统，把自己与世界隔开，关在小圈子里自说自话，自我欣赏。但问题是，经历了20世纪政治的、文化的、甚至语言的重重分裂之后，还有一个纯粹的中文语境吗？没有，却虚幻地谈论它，是浅薄的一厢情愿、或更庸俗的商业化？但不走这个捷径，则意味着必须在全方位上接受“他者”的检验：背后是中文古典诗

歌杰作的“他者”，面前是古今世界文学精品的“他者”，谁能做到全方位的不可替代？这问题是提给诗歌的，更是提给人的。一个“主动的他者”，核心之点在“思想”一词上。全球化语境中，我们能否找到——创造一种更深也更更新的标准来判断作品？去建立那个理想中“诗意的全球化”？

我以为，诗歌的国际交流，必须立足于不同本地的深度。根决定着枝叶的生长。当代/中文/诗，三个词包含着三重提问。一、“传统与现代”：如何理解过去三千年里中文古典诗歌的持续转型，又如何在当代增强其转型的能量？二、“中文与外文”：全球化的现实，带来了更大的市场还是更深的困境？如何从更彻底的“不可能”出发，揭示中文包涵的精神启示和质量？三、“人学与文学”：如何拒绝任何借口的简单化，坚持持续地赋予形式，用诗作的创造性呈现思想的深度？这三重提问，其实是每个中文诗人自我追问的三个层次。但，它对我们应该不陌生。

两千三百年前，中文诗史上留下名字的第一个诗人屈原，就以他的长诗《天问》，给后代竖起一个高标。一首问“天”的长诗，从宇宙起源，经自然万物、神话历史、政治现实，到诗人自我……近二百个问题，却无一句答案。正确地说，整首诗的能量，正在于以问题“加深”问题。这位中文里的但丁，遗留给我们一个专业提问者的姿态。那问题中的问题是：“你有更深刻提问的能力吗？”这个声音，像一个精神血脉，流淌到今天，依然鲜活。

我曾用“眺望自己出海”这行诗句，概括中国 20 世纪至今的历史，其中也包括我自己和所有中国诗人的命运。一个意象：诗人站在海岸边的峭崖上，眺望自己乘船出海。这既基于我自己亲历的国际漂流，更在给出一种思维方式：所有外在的追寻，其实都在完成一个内心旅程。中国现当代的历史，勾勒出了中文诗人精神困境的轮廓。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，西方物质和文化冲击下，满清皇朝崩溃，但“新文化运动”追求现代化的狂热，却表现为对自身传统极端虚无的态度。一种缺乏自觉，从此投下长长的阴影。1949 年以后的中国，本身就是一个观念上的自相矛盾：冷战的“国际”意识形态语汇，混淆了民族主义和专制传统的内涵，缔造和传播着思想的空白。文革结束后，贯穿 80 年代的现实和文化反思，是当代中文诗的真正起源。那个思想激荡的十年，至今仍然令诗人们充满“乡愁”。回顾起来，并非因为那时曾产生过多少精深的观点、丰满的作品，相反，那时大多数广为传颂之作，大多经不起重读，就是说远未成熟。曾经激动我们的，其实是一种特定时代里人生、思想、创作间深刻的生死同步。一个文学史上罕见的、生命即是诗歌的命运时刻。追问文革“谁之罪”的能量，促成对历史、传统、语言、文化心理、乃至自我潜意识的层层反思。那像一种思想“语法”，既是回顾中国，更在打开解读世界的方式。最美丽的交流，仍然是“知音”那个词：我们得在自己内部，“听懂”别人。这里，“思”与“听”融融为一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中

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，本身就是一首史诗，其深刻的思想意义，还远没有被世界（包括我自己）充分认识到。那怎么办？是归咎于 90 年代以后泛滥世界的“利益主义”，且自己也加入它分一杯羹？还是不放弃我们的“出海”，继续像屈原和但丁那样漂泊，汲取痛苦反思的能量，哪怕这在今天仅仅是个人行为？答案当然是后者。但别误解，这并不沮丧。21 世纪的思想特征，正是个人的孑然独立。我们不再能依托民族、文化，乃至“东西方”等等群体模式。每个人都得全方位筛选世界资源，来建构“自我”这座精神之塔。所谓“国际对话”，像一阵清风，只能吹拂在这一座座个性之塔间。对于折磨国人够久的体、用话题，我给出的定义是：独立思考为体，古今中外为用。我这条小船沿着它航行。同样的思维，也引领着穿行于世界文化汪洋大海的每条航船。我们用诗歌的旗语遥相呼应。这本《唯一的母语——诗意的环球对话》，就是我们的航迹。

二

深刻植根于“中文之内”写作的诗人，由于其他原因，成为外语世界的漂流者，这是中文诗有史以来，一个全新的现象。除了“名声”、出版等不值一谈的问题，它对我们的思想和写作，究竟有没有或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？这里，第一是在问：我自己能从那碰撞中学到什么？

第二个也并非不重要：我的经验和思考，能给世界提供什么？事实上，我在国外生活的每分钟，就是一场不间断的“国际对话”，而出国后参加的无数文学节、文学项目，更提供了许多深化这种交流的机会。如果说，我在中国就追求建立“自觉”——从人的自觉到诗的自觉——那么，这环球文学之旅，就不仅在给它增加广度，更增加了深度。目标呢？其实并不奢华庞大，我只希望，互动的结果，将催生一首（哪怕只是一行）有深度、耐咀嚼的中文诗。

我的第一次有意识的跨国诗人对话，机缘于与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 2002 年在约旦阿曼国际诗歌节上的相遇。如果没有这个对话，以及由此开始的对话系列，阿曼或许早已和其他地点一样，沉没到我的文学履历里了。但幸亏，我对中东古老历史的好奇和对它当代处境的困惑，使我没有停留于旅游者的表面，从到达阿曼开始，我就期待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，去问，也获得解答。对这渴望，阿多尼斯恍如天赐，给了我充分的满足。他的阿拉伯现代诗创始者身份、他汲取世界灵感而用阿拉伯语创作的大量作品、他绝然独立的思考态度和思想深度、他为坚持这份独立忍耐的世界性漂流，以及最根本也最美丽的，他对阿拉伯文化诚挚的爱，在使我敬佩时，更给我启迪。从那时到现在，我们的对话，已经发展成一种系列，一个独特的国际文化现象。它们令我特别感动之处在于，远隔万里，如此不同的两个语言文化，仅通过诗中隐含的“人之处境”那条幽径，竟互相理解得如此充分！

“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”，这句话的美感，在于中文和阿拉伯文的诗歌，对别人或许“神秘”，但在我们之间，却敞开得晶亮透明。不是别的，恰恰是诗，保持着对政治简单化、商业庸俗化的先天拒绝（而非被拒绝）。我们当然对反独裁、对巴以冲突有明确的态度，但那是做人的起点，而非诗歌的目的。诗歌的“激情”，必须和群体的“情绪”区分开来。诗歌“激情”始终在质疑自身，并在每一行中经历毁灭和重建。“情绪”则经常流于色彩变换的口号，刺激听觉却失之浅陋。困境在创造沟通。中国和阿拉伯的思想者，都必须双向“独立”：对内，在自己文化的复杂转型中，既理解其难度又把握其能量，拒绝任何形式的肤浅偏激，却始终坚持冷静的自觉。对外，不追随异国情调和居高临下的简单化，保持对全方位现实的批判性，在世界性思想危机中，发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独立思想者的声音。我的感动，也同样来自交流的方式：一个中国诗人和一个阿拉伯诗人，完全保持着“第一手”状态，无须经由任何“第三者”转手，就直接达成了完美的交流。好像擦净了一扇总蒙着西方媒体油污的窗户，我们一下子看见了、看清了彼此，且发现有兄弟般的相像！归根结底，我们的理解，来自中国和阿拉伯古老文化这首“原诗”。甚至困境，被理解为某个深刻过程的一部分时，也充满启示。我们的诗作，显现出这“原诗”可见的部分。对话传达的思考，则在探测使冰山浮动的大海。它们继续诗歌的提问。其能量，远比提供答案大得多。可以

说，对困境的独特应对，使每个人在完成一个文化个案。对话就像一场个案们的互相验收。中国近三十年迅疾、多维的演变，阿拉伯世界最近一举重绘政治地图，令预言者们愧悔无地，诗人们却拈花微笑，因为我们的触角，早已探听到了变化的迹象，尽管它们曾是潜流，却逃不过诗歌的听觉。诗歌不忌惮写出“毁灭”，因为它的写，恰在“再生”。如我所说，诗是“一座向下修建的塔”，从最敏感的思想塔尖，审视、整理着现实和文化的秩序。诗在，人就不得不生长，去成为它的塔基。

我把我的一本书，称之为一个个“思想——艺术项目”。它们不停打开新的思想深度，激发出无法重复的形式创造，直到多年之后蓦然回首，突然发现这次“出海”竟已驶出了如此之远的航程。我自己也有一个同心圆：创作无疑是圆心，与创作相关的思考是第一外延，与思考配套的艺术项目在更外围，广义的文化、现实关注（可以是写作可以是行动），则贯穿生活无所不在。

这本对话集，恰是我独特生活方式的产物。什么“方式”？一个中国诗人，住在北伦敦，每个月若干次收拾行囊，跳进地铁直奔希思罗机场，飘洋过海洲际旅行是常事，近处的欧洲，简直像串门儿。十余年下来，每个“目的地”都有了长长一串朋友们的电话，通知抵达的电邮总是用“又来了”开头。对我来说，“伦敦”几乎等于“疲个地理”（我开玩笑翻译的“Piccadilly”）那条地铁线，因为它把我带向机场，一个没有地址的地方，一个地球上的

形而上，一个四通八达却哪儿也不去之处。我的蒙古血统，或许在这儿找到了当代草原。大群陌生人(像羊群?)，匆匆奔向隐秘的方向，擦肩而过时，一丝微笑，凝固在空气中，缓缓消逝。21世纪，人就是这样“存在”的？如此看来，我的生活可以说“丰富”，更可以说“单调”。那种浮泛的、转瞬即逝的相遇，和压根不见面，有什么区别？各种“文学节”，也无非一个个机场。繁忙的时间表，使我无暇深思去做什么，只有当活动变成“下一个”，才匆忙准备一下，接着是那个固定的“程序”：到达，朗诵，收费，走人，与“本地”无关，更与“思想”无关，文学是种“生意”，而生意是活着的“意义”。好危险啊！我们可能享受了掌声，却不知不觉浪费了一生！那怎么改变？我得说，2002年和阿多尼斯的对话，给我打开了一片新的视野。如果我不期而“遭遇”了这种活法，为什么不抓住这难得的机会，有意识地把浮面的寒暄，转化成一种思想碰撞？像太空中两颗星球相撞，击碎固化的外壳，“翻出”我内部的中国中文之思，去逼近其他星球内部的什么“思”，从而看到一阵闪光、听见一声巨响？我的“国际对话项目”就此开始。每当我将去一个地方，感到那儿有某种独特的吸引力在，无论那是什么，我就会考虑，谁是那个合适的对话者？什么是有意义的主题？是的，总是特定的对话者、特定的主题，让一篇对话自然而然地生成。但再仔细看，这里有什么“自然而然”吗？抑或全然仰仗一种自觉？每个提问，在摆上对话的桌面之前，必须先摆进

我脑海里，甚至折磨过我很久，才可能变成语词，让对话者听到，让录音机录下，最终写成这里的文字。也通过这文字，那些我们对话的场景，才跳出时间的逝水，停留在我手掌中。无论阿多尼斯面前那一杯阿拉伯咖啡浓浓的香气，还是积雪的白桦树林中米库舍维奇小木屋里伏特加的热度，又或者和阿莱士首次在迪拜“帆船宾馆”、继而在成都白夜酒吧的倾谈，都被文字留下，隐现在字里行间，成了“思想”的有机部分。“思想”，在一个个地点深处，给我们的存在唯一一个地址。

三

这本书不大，其中的对话，既单独成篇，又隐然有某种贯穿。其中，首当其冲是对话的“始作俑者”阿多尼斯，继我们2002年约旦对话后，阿多尼斯的诗作被大量译介进中国，先在《当代世界诗坛》杂志出版专辑，接着在译林出版社出版《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》，老诗人专门从巴黎打来电话，请我为诗选作序，这么美好的机会怎能放过？于是，《什么是诗歌精神？》嫣然诞生，它像个衔接点，归纳了我们上次美丽的即兴演奏，又大大推进了对话的深度。几年以来，通过阿多尼斯和我的精神联系，阿拉伯、中国这两个令西方既好奇、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文化，像打开了宝盒，不再被一厢情愿的“东、西方”群体划分所遮盖，而是呈现出传统深处个性创造力的基因，使它们

现代转型的地平线清晰可见。应“中华读书报”之邀，我们再接再厉，又进行了一次题为《诗歌是一种伟大的思想》的笔谈。这次发表，我把它改为更切题的《再谈“主动的他者”》。

“他者”一词，自从由伟大的阿拉伯思想家赛义德“发明”以来，曾风行世界，但那究竟是什么意思？谁是“他者”？该怎样改变被别人“他者化”的命运（无论那意味着虚假的高抬或更糟的“优待种族歧视”——为无须一视同仁的他者们降低标准）？相对于被动的处于“被他者”的处境，我们强调的是：作一个主动的他者。不仅别的文化、包括自己的文化都是他者，都必须面临“自我”的重新筛选、重新组合。就是说，没有固定化的所谓“传统”，有的只是“一个人的传统”，在随着自觉不停深化。与依然以主流自居的西方比，我们的文化困境反而成了优势，因为“全球化”的多重文化参照，对西方还颇像天方夜谭，对我们却是切实的知识结构。再考虑到对语言本身的反思，很清楚的结论是：我们只能自己回答自己的提问。这是绝境吗？抑或超强能量的绝处逢生？“主动的他者”，倚靠不上其他，除了痛苦深刻的自我反思。

在柏林，2006年，我与著名的南非诗人汴庭博（Breyten Breytenbach），相遇于“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”颁奖仪式，那导致了对话《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》。这个句子，后来被我常常引用。因为没别的语言，能把诗歌在我们人生、思想中的位置，概括得更到位了。因此，